



田野归去来——人类学实证研究丛书

彭兆荣 主编

Outcries of the Newly-relocated Village
Heritage Movement and Village Politics

喧嚣的新村

遗产运动与村落政治

龚坚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013038825

K925.7
02

Outcries of the Newly-relocated Village
Heritage Movement and Village Politics

喧嚣的新村

遗产运动与村落政治



龚坚 著

K925.7
02



北航

C1644349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喧嚣的新村:遗产运动与村落政治/龚坚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 5

(田野归去来——人类学实证研究丛书)

ISBN 978-7-301-22422-9

I. ①喧… II. ①龚… III. ①文化遗产-申报-影响-乡村-社会生活-研究 IV. ①G04 ②C912.8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77206 号

书 名: 喧嚣的新村: 遗产运动与村落政治

著作责任者: 龚 坚 著

责任编辑: 董郑芳 倪宇洁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22422-9/Q·0135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新浪官方微博: @北京大学出版社

电子信箱: ss@pup.pku.edu.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3121

出版部 62754962

印 刷 者: 北京大学印刷厂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650 毫米×980 毫米 16 开本 12.5 印张 185 千字

2013 年 5 月第 1 版 2013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8.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信箱:fd@pup.pku.edu.cn



田野归去来——人类学实证研究丛书
彭兆荣 主编



田野归去来

(丛书总序)

彭兆荣

田野作业是人类学的“商标”。以今天的眼光看,没有田野,便根除了人类学这一学科。人类学对这一商标的确认曾经历过一个历史性认知过程,不管马林诺夫斯基和博厄斯所开创的田野范式是否构成对“太师椅式”问学方式的“范式转型”,人类学界对于这些学理问题的讨论已经很多,很充分,此处不予赘述。

“田野”首先是一个异乡地理空间和人文空间的完整实体,民族志者只有离开自己所熟悉的环境和由母体养育所形成的文化惯习场域,才谈得上对“异文化”的观察、认识和研究。“归去来”不啻为形象描述;它已非陶公《归去来兮辞》中“三径就荒,松菊犹存”独善其身式的隐居,而是人类学学科的公共规约。

“田野归去来”表现为一个身体践行的组合行为,其目的和目标具体而切实,它不是乡村旅游,也不是生态旅游,而是人类学者通过最为简单的“归去来”方式,一方面参与观察对象的文化全景,另一方面“朝圣”般地奉行学科旨意,“炼狱”般地进行身体考验和心灵拷问,最终通过“主位—客位”的双重考试。

田野作业同时也是民族志所通行的“质性研究”的简编版本。费孝通先生以“解剖麻雀”予以概括,生动而贴切。麻雀虽小,五脏俱全;长时间深度观察和研究一个小社会、小族群,本质上与研究复杂社会、复杂人群有共通之处,仿佛细胞之于身体机能。



人类学“小社会”的实地研究决定了其“在日常中发现异常和非常，在平凡中体会不凡和非凡”的特点，这使得人类学者不仅能体验到“地方性知识”中的“地方感”，习得田野作业的技巧和技能，获得对“异文化”的认知，也体现了人类学整体研究的旨意。因此，“现场”成为一个关键词，它是“田野”的根据地。

“现场”表现为特殊的结构场域，包含历史、传统、文化、生态、民俗等“历时—共时”全景，是特殊人群、族群生活的场所；遂为民族志者最基本的“工作作坊”。甚至人类学家也在某种程度上参与了这一“现场”性历史和文化叙事的建构工作。所以，“我者的现场”与“他者的现场”语义叠加，色泽交映。

于是，“实证”便成为一个有限性概念，它关乎用“客观”的手段和技术寻找所谓的“原真性”。而二者皆由人完成。天下之事皆为“事实”，观察到的、感受到的、体验到的主体是人，因此对“事实”作判断必然言人人殊。对于任何人文学科来说，“实证”的最大公约数是学者们对“真实性”判断所呈现的启示录。

藉此又将当今民族志范式的转型和实验民族志带回到民族志是“科学的”还是“艺术的”原生性层面，也带出了“实证”之重在于获取可资验证的“事实”，还是“事实之后”的阐释诸热话题；逻辑性的，人作为实证工作的主体和介体，即“身体理论”也就顺理成章地进入到研究视域。“每个人都是典型”，是谓也。

回眸“本土”实景，人类学“舶来”中国已近百年，中国的人类学者一直在这一学科的历史“引渡”中苦苦求索“中国化”的生长机理。然而，这一外来“物种”在中国“百年孤独”的际遇，致使其实直至今日仍给人以在“西装”和“长衫”的组合中未及“美美与共”之境，尽管其中不乏偶尔精彩的亮相。

窃以为，中国人类学研究需重“三线组合工程”，即人类学知识谱系与国际人类学同步伸展，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学科特色之机理和进行扎实的田野个案研究。人类学界有“大/小人类学(家)”之说，“大”者，侧重建构“文化语法”，“小”者专事民族志的精致案例。彼“大/小”非此“大/小”，没有高下分类。

窃以为，中国人类学在当下的研究要注重全球化视野中地方、族群与民族国家互动所生成的新的文化质丛(英文为 cultural complex，意思是文化元素的集结和组合)、新的文化样态以及跨文化对话与理

解。毕竟,传统“不变的社区”已越来越少,即使有,也越来越难以存续。如何在多维视角中保持民族志范式和法典,各种实证、实验和实践已属必然态势。

本丛书即是“田野归去来”的果实,呈现出人类学研究在面对当代社会文化事象时所激发出新的阐释力、理解力和方法论。全面贯彻以上“三实”(实证、实验、实践)的原则,既遵循传统民族志范式的基本义理,又兼顾现代快速变迁的社会所生成的新景观,以中国的文化“语法”进行独立自主的探索工作。

本丛书分为三个子系统,分别是“人类学与乡土仪式”、“人类学物质研究”以及“人类学、遗产与旅游”,从三个研究视域出发,管窥人类学特色,展示国内一批年轻学者立足人类学理论进行跨学科研究的最新努力,也较为集中地体现了我国人类学研究的一个发展趋势。

本丛书所有作品的作者都是本人近十年来带出来的博士(博士后),但我不敢“专美”,因为那都是他们辛勤劳作的结果。作品以实证为据探讨人类学学理、学问和学术。丛书部分体现了本人的学科理念、学术专长和教学风格,更是作者们个性化的呈现。其中有些弟子受到过人类学大师的指点。他们是正在成长的一代。

任何实验和实践都包含摸索的意义,无论成功与否,都将带给读者各种各样的启发;这些启发可以在人类学学科之内,也可以在诸学科交叉领域,还会对那些未入行的蓄势待发者产生影响;这种启发包含着激发新一辈对“小地方,大事务”乡土社会的关注,并产生对人类学图景的憧憬和“入行”的热情。

任何事业都是代际性的,因此,顺利的代际交接是保证一个学科事业永续发展的根本。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套丛书是对这一代“导师”教学效果的测试,同时也是中国人类学学科在特定、特殊历史时期发展的一部分,是中国特色的人类学教学之于特定时期的教育体制的历史反映。我们没有理由和能力超越历史。

中华文明浩浩汤汤,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她多元、多样、多彩,成形于“多元一体”的自在与自觉;成就于“自我的他性”的实在与实体。“田野归去来”丛书正是对这一集中国知识、中国智慧、中国经验为一体的探索和思考、实验和实践的集体献演。让我们为之喝彩吧!

目 录

绪 论 / 1

第一节 世界遗产地村落的相关问题 / 2

第二节 世界遗产地村落的民族志调查 / 8

第三节 主要关注点与研究意义 / 12

第一章 遗产运动与村落政治的人类学研究 / 15

第一节 遗产与遗产运动回顾 / 15

一、国际视野中的遗产概念 / 15

二、中国的遗产概念及演变 / 21

第二节 人类学取向的遗产研究 / 25

一、国内遗产研究的三种范式 / 25

二、国外遗产研究回顾与展望 / 35

第三节 遗产运动对村落政治的影响研究 / 48

一、村落政治的人类学研究 / 48

二、“遗产运动”场域中的村落政治及变迁研究 / 52

第二章 新村田野图景 / 54

第一节 武夷山的人文地理 / 54

第二节 新村的社會结构与政治组织 / 59

一、新村的界说 / 59

二、新村的經濟背景 / 62

三、新村的社會结构与权力关系 / 66



小 结 武夷山遗产的传承主体 / 71

第三章 “世遗”情境中的遗产申报与村落拆迁 / 73

第一节 “申遗”现象与新村的拆迁 / 74

第二节 “暗流”涌动：“挖路”事件分析 / 86

一、“挖路”：一纸“政府令”激起千层浪 / 87

二、事件背后的“洪流” / 93

小 结 遗产主体的边缘化与权力的隐喻 / 95

第四章 遗产的归属与地方的声音 / 98

第一节 山林“确权”的由来 / 99

第二节 “三访”——“世遗”语境中的诉愿机制 / 103

一、“三访”始末 / 104

二、转机：“面呈领导” / 110

第三节 新村群体性上访中的权力关系分析 / 115

一、官方的“摆平术”及其效力 / 117

二、“上访”场景中的地方精英 / 120

第四节 传统“斗茶赛”的接续与重构 / 125

小 结 遗产权属的变更与地方民众的回应 / 132

第五章 村落政治与权力关系的重构 / 135

第一节 “世遗”补偿款引发的村落纠纷：“外嫁女”事件 / 136

一、事件原委 / 136

二、到市里“讨说法去” / 140

三、出乎意料的结果 / 141

四、影响 / 142

第二节 村民选举中的权力展演 / 142

一、2006 年的村民选举：村民代表与村委选举的“台前幕后” / 143

二、2009 年的村民选举：地方精英的“隐性”力量 / 146

小 结 世界遗产的后续影响：村落内部关系的紧张与疏离 / 151



第六章 总结与讨论 / 153

第一节 缩放式回顾新村的“世遗”经历及变迁 / 155

第二节 地方民众的回应与“文化自觉” / 158

第三节 遗产运动中国家与地方社会的互动 / 161

第四节 进一步讨论“家园遗产”的理想与人类遗产的实践 / 166

附 录 / 171

参考文献 / 183

后 记 / 191

图表目录

图

- 图 2.1 武夷山世界遗产申报区域(武夷山景区管委会供图) / 57
- 图 2.2 新村位置示意图(Google 卫星地图) / 60
- 图 3.1 “申遗”拆迁现场(武夷山景区管委会供图) / 81
- 图 3.2 通往景区的“茶路” / 91
- 图 4.1 福建省崇安县土地房屋所有证(1952 年) / 102

表

- 表 1.1 2000—2011 年期间以遗产保护为主题的博士论文概况 / 27
- 表 1.2 《国际遗产研究期刊》创刊以来研究主题及其变化 / 36
- 表 2.1 新村 1958—2008 年间户数与人口数量的初步统计 / 61
- 表 2.2 新村干部的分工与岗位职责 / 69
- 表 3.1 村民外迁意愿调查分析表 / 84
- 表 3.2 对景区封闭管理的看法 / 90
- 表 5.1 是否关注村务 / 151
- 表 6.1 新村的“世遗”经历 / 155

绪 论

本书是一部有关遗产地村落的民族志,主要讲述坐落于福建省武夷山境内的新村^①在面临遗产保护运动时的境遇、反应,以及村落权力结构的变迁与重构。全书以世界性遗产运动的产生发展为场域,深入分析武夷山地方文化与世界遗产(“世遗”)保护、遗产政治与村落权力关系变迁等问题,探讨遗产保护运动中新村村民的行为方式与应对手段,以回应人类遗产保护的时代主题。

武夷山位于闽赣交界的武夷山脉北段,是中国历史上的名山大川之一。它历史文化底蕴深厚,朱子理学发端于此,儒、释、道汇集于此,为武夷山留下了丰厚的精神文化遗产。唐宋时,“武夷茶”声名鹊起,至元朝时被封为“贡茶”,与之相关的制茶、品茶、祭祀茶神的习俗源远流长。随着茶市贸易的兴起,武夷山文化也声名远扬。近代以降,因自然生态的完整性,武夷山曾先后被辟为“国家自然保护区”、“国家级重点风景名胜区”,以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与生物圈保护网”的世界自然保护区。1999年,武夷山国家自然保护区、武夷山国家风景名胜区与闽越王城遗址入选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我国第四个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地)。可以说,武夷山文化已经历从地方文化到“国家遗产”再至“世界遗产”的过程。因此,武夷山及其地方文化无论在遗产研究上,还是在武夷山民众中都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近代以降,数量众多的村民曾广泛分布在武夷山内,并先后历经“战争洗礼”、“新政权的建立”、“土地改革”、“文化大革命”、“改革开

^① 依据研究惯例,“新村”是笔者田野调查点村落的化名,同样,书中出现的人名均是化名。



放”，等等，早已与武夷山的自然环境、人文生态融为一体。而且，这些村民以山为家、以茶为生，构成了武夷山茶文化的重要载体，武夷山宗教文化的实践主体，以及武夷山自然与文化遗产的传承主体，他们是武夷山遗产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应武夷山申报世界遗产（“申遗”）的需要，武夷山景区内的村民们纷纷外迁，被统一安置于景区外的两个小区。在本书中，安置区被称为“新村”，因为，它在空间构成、生存方式、人际关系、权力结构等方面已经发生新的，并与遗产紧密相连的变化。此外，“新村”还指代遗产保护运动中遭遇拆迁、重新安置的所有村落。因为遗产申报与管理、景区改造等都涉及遗产地内的民众，那么为应对不断增长的人口数量以及遗产保护与旅游发展的诸多问题，遗产地的民众外迁成为当下最普遍的做法。因此，“新村”也就具有了相当的普遍性和典型性。

武夷山“新村”因申报世界遗产由迁而建，在这一过程中其身份由“主”而“客”的改变以及有关遗产权属的变化引发了村民与遗产管理方关系的紧张、村民内部关系的疏离、村落政治的变迁，遗产保护与村民生存发展之间的矛盾、遗产保护与旅游开发之间的矛盾日趋彰显，于是随之带来新村村民与遗产管理方之间的较量、民众与政府的对抗、民众文化保护意识的转变等一系列问题。

本书以福建省武夷山新村的遗产化遭遇为中心，通过对武夷山“申遗运动”的实证研究，力图呈现新村村民如何面对村落拆迁、遗产权属的变更，以及做出的各种回应，试图解答如下问题：其一，全球性“遗产运动”进入中国的路径与影响问题；其二，遗产运动背景下国家与地方的互动关系问题；其三，遗产运动对乡村社会尤其是村落政治的影响问题，譬如地方文化的“消解”、重构或发明，地方社会对遗产运动所做出的回应，进而探讨遗产保护、管理与发展等问题。

第一节 世界遗产地村落的相关问题

20 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及现代工业文明对人类遗产造成了毁灭性的破坏，同时也把人们引入对工业化和现代性的反思中。在跌宕起伏的社会变革与环境变迁中，新旧事物更替迅速，“传统”的世界行将消逝，由此社会运动和环境运动层出不穷，“怀旧”情结也在此过程中

被催生出来,西方强权国家开始对自然和文化体系因遭到毁灭性破坏而不可恢复感到遗憾。此外,生态环境的日益恶化,语言种类的严重“缩水”,群众旅游的冲击,地方文化的悄然消逝等都使人们越来越相信,文化不仅仅是一个整体的概念,更是一个由过去、现在和未来共同组成的网络。而人类遗产恰恰是这一网络中的节点。在这一社会背景下,抢救濒临消逝的传统、保护多元的文化样态成为一种共识。

在上述人文思潮的影响下,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倡导下的遗产保护迅速在全球范围内传播起来,同时也把“文化遗产”、“自然遗产”、“世界遗产”等概念推向世界各国和地区。此外,由于遗产与现代旅游的不谋而合,遗产旅游迅速成为拉动地方经济的“马车”,还成为弘扬地方文化、实现全球性诉求的途径。因此,在“合力”的推动下,许多国家与地方社会开始了轰轰烈烈的“遗产申报运动”。至2012年,我国共有41项遗产入选世界遗产名录,居世界前列,其中包括26处世界文化遗产、8处世界自然遗产、4处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遗产和3处世界文化景观。

毋庸置疑,我国在世界遗产的保护与管理方面投入颇多,如财政扶持、政策优惠、立法保护等等。地方政府更是不惜斥巨资对遗产地及其周边环境进行整治建设,聘请专家进行规划与整修,并加强对遗产区域内及其周边民众的管理,从而试图打造出集人文景观与自然美景于一体的“世外桃源”。按照常理,世界遗产区域内及其周边民众应当以其家园感到自豪和骄傲,并在这里安居乐业。但情况果真如此吗?举例来讲,安徽的宏村古村落在列入世界文化遗产以后,村民们却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宏村人不仅没有享受到作为主人的尊严和权利,而且为争得这份权利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在宏村人看来,他们拥有古民居的房产权,那么他们理应是古民居的所有者。不过,宏村古村落的旅游经营权却几易其主,由县旅游局转包给镇政府,而镇政府又以招商引资的名义转让给北京中坤集团。显然,遗产的所有权与使用权在保护遗产与发展旅游的过程中发生分离,由此造成村民与地方政府以及遗产管理方之间关系的破裂。之后,宏村人以收回旅游经营权和保护财产权为由把地方政府与遗产管理方告上了法庭。其结果是,黔县司法局、黄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及黄山市高级人民法院都以证据不确切为由驳回了村民的申诉。由此宏村人深感“世遗”身



份所带来的生活不便,感到生存空间日渐变窄。^①那么,宏村的例子是不是表明其他世界遗产地村落有共同遭遇?宏村人的遭遇说明了什么?这给社会带来了哪些思考?

近年来,世界遗产地武陵源的旅游发展与遗产保护的矛盾冲突,如“黄牌警告事件”、“观光电梯事件”等都曾引起政府部门、专家学者以及社会公众的普遍关注。通过武陵源在遗产保护与旅游开发过程中所呈现出的种种背离,有学者指出,“资源的处置权的非排他性以及外界制度性的监督缺位”是导致世界遗产地政府治理失灵的主要原因。具体而言,“资源非排他性处置权”造成了遗产资源的过度开发与利用、社区居民的冲突加剧、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并在一定程度上对世界遗产武陵源的真实性和完整性造成威胁。换言之,“世界遗产”的名号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武陵源被评为世界自然遗产以后,通过宣传促销、招商引资、加强景点基础设施建设等,其旅游得到进一步发展,地方经济也有较大发展;另一方面,世界遗产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地方社会的“躁动”与分裂,譬如村民的贫富差距增大,社会冲突加剧,“2000年武陵源景区实行大拆迁后,社区居民的冲突更是频繁”^②。此外,由于大部分遗产地既没有土地权,也没有山林权,只具有名义上的规划面积,因此这些规划区域“始终存在着占用农民集体土地与农民对土地占用补偿和亟须利用土地诉求的对立和矛盾”^③。而且,遗产保护的相关政策与措施造成了地方社会尤其是遗产区域内的村民生产生活上的不便,并进一步引发民众与政府、遗产管理方的紧张关系。从而,遗产保护与地方民众生存发展的矛盾以及村落内部关系的紧张也日益显现。^④

我们再来看看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地武夷山的情况。20世纪90年代初,武夷山着手准备申报世界遗产,当地政府和武夷山景区管委会(以下简称景区管委会)为此做了大量的工作,如投入巨额资金、建

① 张华侨:《一个世界文化遗产乡村的抗争》,《中国社会导刊》2006年第3期。

② 张朝枝:《旅游与遗产保护——政府治理视角的理论与实证》,中国旅游出版社2006年版,第149—152页。

③ 张晓、钱蕊红:《自然文化遗产对当地农村社区发展的影响——以北京市为例》,《旅游学刊》2006年第2期。

④ 张朝枝:《旅游与遗产保护——基于案例的理论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04—107页。



立各级整治建设“指挥部”、拆迁村落、补偿村民等。1999年武夷山“申遗”成功后,他们在遗产保护方面也开展了诸多工作,如创建专门的世界遗产保护局,下设世界遗产监测中心和文物宗教股,以及三个保护管理中队;聘请专家对遗产区域进行规划,进行分级保护;投资4.8亿元,进行世界遗产保护一期、二期工程,搬迁685户文化与自然遗产地居民,对文化遗产地和文物保护单位周边环境进行专项整治;对景区实行智能化管理,以实现遗产区域的封闭管理等(详见附录1)。^①可以看出,地方政府和遗产管理方对遗产的保护与管理可谓“竭尽全力”。然而,武夷山遗产区域内及周边的村民并不太认可他们的工作。“因为这次申报‘世遗’搬迁,景区管委会给我们带来了各种困难,加重了我们农户的负担,广大村民强烈要求人民政府针对世遗拆迁所遗留下的各种问题做出尽快解决。”在新村村民看来,他们村集体所有的山林和田地面积约占景区的80%,而且“武夷山至今有这样完好无损的生态环境和文化遗产,都是我们新村人祖祖辈辈保留下来的成果”。^②所以他们认为,他们不能只有维护的义务,而无受益的权利。于是,新村人为了世遗拆迁补偿、山林“确权”、分享遗产旅游带来的收益等曾多次拦截票口、集体上访,给地方政府和景区管委会施加压力。他们之间的博弈与紧张关系引起了福建省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之后,基于遗产管理方与村民之间多年的协商、沟通,村民终于获得了相应的补偿,封闭管理也被延期。而事情并未由此完结,“世遗”遗留问题、补偿款的分配问题等仍继续影响着村落社会,并在村落政治中不断显现,如地方精英与村委会的紧张、村民关系的疏离、村落纠纷的发生、村民保护遗产意识的转变等。

不难发现,带着“夺目光环”的世界遗产地并非“世外桃源”,遗产保护甚至还出乎意料地造成遗产的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分离,遗产地民众与政府以及遗产管理方关系的紧张,地方民众生存发展与遗产保护的矛盾,遗产保护与旅游开发之间的矛盾,以及地方社会内部之间的紧张与疏离等。总而言之,世界遗产的到来已经把地方社会纳入全球性的遗产运动中,在此场景中,地方社会与遗产本身及遗产管理方的

^① 《武夷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世界文化遗产保护情况说明》(内部资料),2005年11月15日,笔者田野资料。

^② 《写给福建省人民政府的报告》(内部资料),2005年,笔者田野资料。



关系面临全新的挑战与前所未有的冲击。值得追问的是，当下世界遗产的保护实践为什么会引起地方社会的诸多反应？地方民众的回应说明了什么？在全球性遗产运动的特定场域中，国家、遗产与地方社会之间是如何互动的，它们之间的矛盾与分歧又要通过何种方式来破解？

以上问题的凸显已经引起全社会的广泛关注，而在社会人类学的研究领域，学者们纷纷采用“国家与社会”的分析框架对地方社会与村落文化进行研究（详见第一章）。不过，这方面的研究对全球性的遗产运动及其影响的关注仍然不够。究其原因，一方面，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遗产保护运动虽方兴未艾，但在中国社会，其影响与冲击较为有限。进入21世纪以来，遗产运动在全球范围内的影响日渐显现，尤其是随着中国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的《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以来，我国的遗产保护越来越与社会发展紧密地结合起来。另一方面，随着全球化、世界一体化进程的加速，“地球村”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遗产的“地方性”，实际上，它却使地方文化、自然生态、乡土社会等面临种种变迁甚或重构。可以说，即便是全球化程度不高的村落社会也难以避免地受到了遗产运动的影响和冲击。在这样的背景下，人类学取向的村落社会研究同样不能缺失遗产运动的视角。本书正是在此层面上去探讨遗产运动背景下的国家与村落社会互动的研究。

本书基于新村的个案研究，试图探讨遗产运动的内在逻辑与“权力”样态对民族国家、地方社会的影响。首先，从当今的遗产运动来看，世界遗产已不仅仅是一种文化的表征，也不只是一张烫金的“名片”和一辆拉动地方经济的“马车”，更是一种反映民族自豪感、国家力量、国际影响力的政治隐喻，世界遗产越来越成为“国家遗产”^①的代名词。尤其是在民族—国家的名义之下，“国家遗产”已经具有特定权力和政治共同体的内涵。遗产与权力的这种关系至少可以从以下三个层面进行理解。其一，世界遗产及全球性的遗产体系体现了明显的西方价值与“文化霸权”，这一点又集中体现在世界遗产的概念、分类原则、申报遗产的标准以及遗产保护的模式等方面。其二，在世界遗

^① 彭兆荣：《以民族—国家的名义：国家遗产的属性与限度》，《贵州社会科学》2008年第2期。